

絕 唱——

# 漢代歌詩人類學



高莉芬 著



絕唱：

# 漢代歌詩人類學

作者◎高莉芬

絕唱：漢代歌詩人類學／高莉芬著．——初版．

——臺北市：里仁，2007〔民96〕

面；公分

參考書目：面

ISBN 978-986-6923-15-9（平裝）

1. 中國詩—歷史—漢（公元前206-公元220）

2. 中國詩—評論

820.9102

96005435

· 本書經作者授權在全世界出版發行 ·

絕唱：

## 漢代歌詩人類學

高莉芬 著

校讎人：作者自校

發行人：徐秀榮

發行所：里仁書局（請准註冊之商標）

台北市仁愛路二段98號5樓之2

電話：（02）2391-3325・2351-7610・

2321-8231

FAX：（02）3393-7766

Email：lembook@ms45.hinet.net

郵政劃撥：01572938「里仁書局」帳戶

印刷所：福霖印刷有限公司

西元二〇〇八年二月二十九日初版

本書編號：

000348

參考售價：平裝 450 元

ISBN-13：978-986-6923-15-9（平裝）

## 緒論：

### 漢代歌詩與文學人類學研究

#### 一、跨越疆界：文學與文化人類學的交叉視野

人類學 (Anthropology) 一詞的希臘語源是 Anthropos (人) + Logic (學門或學科)，意指研究人的學問。舉凡人、自我及其社群的心理、行為、生存與發展等種種問題皆在人類學探索的範圍之內。人類學研究隨著學科的分化有兩大分支——是偏重自然科學的體質人類學，一是偏重思想文化的文化人類學。此兩大分支涉及討論的內容範圍十分廣泛，又與其他學科的分際模糊。因此英國人類學家哈登 (A. C. Haddon, 1885-1940) 指出：「人類學科範圍之廣，以及它們對其他學科的分界線的模糊，使得對它們進行定義和分類成為一件特別困難的事情。」<sup>①</sup>人類學定義的困難，是其學科的特質之一，但這些特質卻也使它向其他學科開放學科疆界，得以進行互滲融合的發展趨向。尤其是文化人類學探索人類社會中的心理、行為、信仰、習慣和社會結構等範疇，更是與心理學、宗教學、民俗學、社會、文學藝術等學科的研究對象之間具有密切的關係。

人是創造文化的主體，也是為文化所形塑的客體。人類學家格爾茲 (Clifford Geertz, 1926-) 說：「人是尋求意義的動物。」<sup>②</sup>人類之所以異於其他物種，即在於人不僅只求生存，更意識生存；並賦予自我存在的意義以及生存宇宙的秩序，進而創造出豐

富多樣的文化。德國哲學家卡西勒（Ernst Cassirer, 1874-1945）在《人論》中強調：「人是符號的動物。」（animal symbolicum）③人類以符號形式表達思維、創造文化為人類異於其他物種的本性與特質。卡西勒指出：「人不再生活在一個單純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命在一個符號宇宙之中。語言、神話、藝術和宗教則是這種符號宇宙的各部分，它們是組成符號之網的不同絲線，是人類經驗的交織之網。」④在人類所創造的符號宇宙中，文學和藝術是人類文化重要的形式之一，也是文化人類學研究關注的重點。早期文化人類學家關注神話傳說和原始藝術如圖畫、雕刻等，後期的文化人類學家也關注作家創作和藝術家創作。

由於文學表達人類的情感、人類的感知與存在意識，是人類精神的產物；而文化人類學則是研究人類社會中的行為、信仰、習慣和社會組織的科學。二者都屬於人文學科的範圍。二十世紀以來，文化人類學家將視野擴展關注到文學藝術的領域，而文學批評學者也接受文化人類學家之概念方法，進而深化了文學與文化之間的影響研究，開展出文學研究新的視野與方法。到了二十世紀後期，已有以「文學人類學」為主題的學術論文集⑤。八、九〇年代，在人文學科跨學科研究的趨勢下以及文化詩學的興起，「文學人類學」日益受到學界的關注，依其理論重點發展出不同的派別。

在台灣學界目前並未發展「文學人類學」此一新興學科。人類學家李亦園論道：「台灣沒有文學人類學。英語課也沒有明確而嚴格的『文學人類學』。只有 Anthropology and Literature，或者 the Anthropology of Literature 之類。這是兩門學科互動的新學問。」⑥但李亦園也進一步指出「文學人類學」研究的積極意

義：

傳統的文學研究著重的是文本，而人類學則著重過程。這樣文學研究就必須既著重文本，又著力於文學的、文本的形成過程，而絕不僅僅是版本的考據與整理。<sup>⑦</sup>

而「文學人類學」這種既重文本，又重視文本形成過程與文化語境的宏觀視野，可以提供文學研究的跨文化與跨學科視野；進而建立起自我的文化體系，與掌握文學發展的規律。

二十世紀的文化人類學與文學批評的交流互動，葉舒憲在《文學與人類學—知識全球化時代的文學研究》一書中<sup>⑧</sup>，將兩大學科間的跨學科研究發展大分為以下五類：一、文學批評家的文學人類學：其中包括了加拿大弗萊（Northrop Frye, 1912-1991）的《批評的剖析》對文學人類學的理論體系建構<sup>⑨</sup>，美國維克里（John B. Vickery）的《神話與文學》<sup>⑩</sup>、德國接受美學家伊瑟爾（Wolfgang Iser）的《虛構與想像：文學人類學疆界》等<sup>⑪</sup>。二、文化詩學：新歷史主義的文化批評：如葛林伯雷（Stephen Greenblatt）的文化詩學研究<sup>⑫</sup>。三、人類學家的「文學人類學」：如波亞托斯（Fernando Boyatos）的符號學的模式建構<sup>⑬</sup>。四、文化主體性與人類學詩學：如有伊凡·布雷迪（Ivan Brady）編選之《人類學詩學》<sup>⑭</sup>。五、口傳文化與「民族誌詩學」：如有美國約翰·邁爾斯·弗里（J. M. Foley）的口頭史詩之研究<sup>⑮</sup>。除了以上五類以外，另外又如有米爾曼·帕里（Milman Parry）和艾伯特·洛德（Albert Lord）兩人的「口頭程式理論」（Oral Formulaic Theory），結合了語文學與人類學，對口頭展演進行考察，研究故事歌手的動態表演語境與詩歌創作間的關係<sup>⑯</sup>，亦可歸之於葉氏分

類的第五類之中。這些研究各有不同的進路，卻都在人類學與文學批評的交叉視野中闡釋了文學多元的面向。

## 二、文獻探討與研究進路

漢代樂府詩以其特有的語言形式、質樸內容在中國詩歌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歷來論者甚多。當代的古典文學研究學者在此一領域上或考其形式特徵、或詮釋詩旨、或建構詩歌發展體系，開展出亮麗的研究成績。如有陸侃如《樂府古辭考》<sup>①⑦</sup>、羅根澤《樂府文學史》<sup>①⑧</sup>、余冠英《漢魏六朝詩論叢》<sup>①⑨</sup>、蕭滌非《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sup>②⑩</sup>、楊生枝《樂府詩史》<sup>②⑪</sup>等。而臺靜農《兩漢樂舞考》<sup>②②</sup>、王運熙《樂府詩述論》<sup>②③</sup>、廖蔚卿《漢魏六朝文學論集》<sup>②④</sup>、《中古樂舞研究》<sup>②⑤</sup>、亓婷婷《兩漢樂府研究》<sup>②⑥</sup>等論著尤重漢代樂府詩音樂性的考察，已強調漢代樂府詩的音樂性質，凡此研究成果斐然。邱燮友《中國歷代故事詩》<sup>②⑦</sup>則以「故事詩」的視角探討兩漢樂府詩，其中亦見對於兩漢樂府詩敘事性之掌握。歷來學者對於漢代樂府詩音樂性、敘事性之研究，已見漢代樂府詩所具有獨特的語言特質與生成環境。近年來亦有學者回歸漢代歌詩的原生語境，直接以「歌詩」為視角進行研究論述者；有錢志熙撰《漢魏樂府的音樂與詩》<sup>②⑧</sup>，研究突顯了漢代樂府「歌辭」的音樂與娛樂功能；而趙敏俐先撰有《兩漢詩歌研究》<sup>②⑨</sup>（1988），後與多位學者合纂《中國古代歌詩研究——從《詩經》到元曲的藝術生產史》（2005）<sup>③⑩</sup>，學者專著題名由「詩歌」到「歌詩」的轉向，可見漢代樂府詩的「可歌性」日益受到學界的重視。錢氏之作從藝術生產理論考察；趙氏之章則

採取馬克思的文藝觀，從生產、消費的觀點探究漢代詩歌之生產消費關係，開展出漢代歌詩研究不同的視野。而吳相洲《唐詩創作與歌詩傳唱關係研究》<sup>①</sup>亦是從歌詩的角度探討唐詩。

本研究亦以漢代可歌之「歌詩」為研究對象，探索其原生形態，但研究進路頗有不同。本研究主要仍視書面文字流傳至今的漢代歌詩既是做為文化文本，也是文學文本，從文本的表演者、創作者—「倡優」的視角切入進行探討。上篇採文學人類學、文化詩學、民族誌詩學的研究視角，重視詩歌創作的環境與「展演」(performance)以及創作者、傳播者與接受者、研究者的再詮釋<sup>②</sup>。強調在文化的整體網絡中重構文學文本、創作者與接受者間的有機聯繫，以發掘在書面文本中所保留口傳文學的傳統。下篇從具體的歌詩與詩歌文本中，採文學人類學的視角，並參酌原型批評之視角，尋繹口頭文本到書面文本中的承變與轉化；探討在表現詩藝與詩情為主的書面文本中，口頭文本以何種的面貌被承繼與轉化？以及在文學創作中歷史文化對文學文本的影響形塑中，閃耀著何種的心靈之光？又言說著何種故事？

### 三、漢代歌詩研究的文學人類學視野

二十世紀以來在現代主義以及比較文學的潮流下，中外文學研究也逐漸走向跨領域學科整合的研究道路，其中亦不乏從文學人類學之視角探討文學的生成與規律者。如葉舒憲之《文學人類學探索》<sup>③</sup>一書對文學人類學研究之理論建構以及實際批評。葉氏採用榮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弗萊(Northrop Frye, 1912-1991)神話—原型批評(archetypal criticism)的方法，又提

出「三重證據法」強調地下出土材料的重要性，積極建構文學人類學的研究體系；張德明《人類學詩學》<sup>④</sup>則比較世界三大古典詩學體系，從而建構人類學詩學的理論。而容世誠的《戲曲人類學初探—儀式、劇場與社群》<sup>⑤</sup>則是從儀式行為的文化人類學視角以及田野調查資料探索中國戲曲的跨學科研究。由於儀式是人類學研究的重心，亦有學者從人類學儀式理論的角度探討文學與儀式間之關係者，如彭兆榮《文學與儀式：文學人類學的一個文化視野—酒神及其祭祀儀式的發生學原理》<sup>⑥</sup>從儀式理論、文學人類學的解釋譜系入手探索文學敘事的原型譜系；胡志毅《神話與儀式：戲劇的原型闡釋》<sup>⑦</sup>亦以原型理論建構戲劇人類學。凡此研究對於文學的生成發展的探討有更寬廣的文化視野與理論高度。這些研究主要建構神話原型批評的理論或是從儀式的角度探索文本，文本類型大多以「戲劇」為研究範圍，內容研究對象亦多以原始戲劇或宗教儀式劇為主。但除了戲劇的形式以外，詩歌與人類文化的聯繫更為緊密、深刻，也更具有普遍的人類學意義。從發生學上考察，詩的起源比其他文學模式要早，與文化同源共生<sup>⑧</sup>。

中國早期的詩歌即是以韻語的形式表述出初民社會的集體意識與文化心理，而歌詩之唱又常依附於特定的儀式活動、文化場所中，具有集體性與社會性的特點，因此，近年來已有學者從文化研究的視角，探究詩歌的起源與發展。如韓高年《禮俗儀式與先秦詩歌演變》<sup>⑨</sup>即是以儀式文化為切入點，探討先秦詩歌的形態、起源與演變。先秦的歌詩具備鮮明的集體性與儀式性，而這種集體性、儀式性的特徵仍然保留在漢代歌詩的吟唱中。降至兩漢，在城市經濟興起，以及娛樂藝術的發達推動下，歌詩之唱，

更具娛樂性以及口傳性。

宋代鄭樵《通志樂略·正聲序論》云：

嗚呼！詩在於聲，不在於義，猶今都邑有新聲，巷陌競歌之。豈為其辭意之美哉！直謂其聲新耳！<sup>④0</sup>

錢志熙據此亦強調樂府古辭的音樂性質論道：

樂府古辭的基本性質，從它的原生狀態來看，首先是一種音樂藝術，然後才是文學藝術。<sup>④1</sup>

從歌詩創作的文化語境考察，漢代歌詩的原生形態，並非為了文字讀者審美期待的創作書寫；而是滿足觀聽眾耳目之娛、聲色之樂的集體綜合表演藝術。因此對於漢代歌詩研究，也可以採文學人類學為研究視角，進而描述古代歌詩的生成背景、文化功能以及藝術形態，以見漢代歌詩生成、發展與演變之遞嬗軌跡。

#### 四、歌詩展演與語境闡釋

歌詩，是指可以歌唱的詩，由於漢代樂府歌詩本為口頭性、集體性、社會性的娛樂藝術，它的生成乃根植於歌、樂、舞、戲諸因素相結合的綜合性藝術系統中<sup>④2</sup>。漢代樂府歌詩的創作，大都與「歌舞」有一定的聯繫，《漢書·藝文志》所輯錄的漢代詩歌作品名之為「歌詩」，不名為「詩」<sup>④3</sup>。現存兩漢大部分有主名篇，多以「歌」與「曲」名篇，具有強烈的音樂與表演性質。「樂府詩」，嚴格來說，應稱之為「樂府歌詩」。因此本研究所進行漢代歌詩研究，主要即指漢代原可供演唱，以表演音樂和歌

舞為主的「歌詩」。

實際上，「歌詩」即歌辭，並非獨立的語言藝術詩歌創作<sup>④④</sup>。《文心雕龍·樂府》即云：

詩為樂心，聲為樂體。<sup>④⑤</sup>

樂辭曰詩，詩聲曰歌。<sup>④⑥</sup>

明確地認為樂府的辭句就是詩，詩句配上音律就成為歌。因此可供演唱的樂府歌詩的生成與發展，與漢代以說唱樂舞為重心的倡優動態的表演語境之間，具有無法分割的密切關係。漢代樂府歌詩之藝術特徵如生動之敘事，戲劇性之情節以及樸實的語言對話，常令後代詩評家讚歎不已。如明人許學夷《詩源辨體》評道：

漢人樂府五言，如〈相逢行〉、〈羽林郎〉、〈陌上桑〉等，古色內含而華藻外見，可為絕唱。<sup>④⑦</sup>

許學夷以「絕唱」稱美漢人樂府五言之作，而胡應麟《詩薮·內編·古體中·五言》則曰：

漢人詩，質中有文，文中有質，渾然天成，絕無痕跡，所以冠絕古今。<sup>④⑧</sup>

胡應麟則以文質相合的特質稱美漢詩。凡此「絕唱」與「渾然天成」等抽象性的讚美評語，正反映出漢代樂府歌詩獨特的藝術美學。

漢代樂府歌詩之魅力在於它是倡優表演語境中的綜合藝術

體，「樂辭」並非純粹文學意義的詩歌。歷來詩評家多置於「文學」或「詩學」的本位去詮釋其意義、評論其價值，但這種後設的純文學觀點，卻與漢代歌詩的原生型態大有不同。因此論者或譏其俚俗不雅，或讚之以「絕唱」、「冠絕古今」、「神化」等譽詞，這些或褒或貶的批評，正是因為傳統的樂府詩學觀脫離了漢代歌詩的具體創作文化語境，純粹訴之於書面文學批評的結果。

由於漢代歌詩是詩、樂、舞合一的綜合表演藝術，歌詩之唱具有口頭藝術展演之性質，若僅以純文學視之，自無法掌握其語言藝術特質。因此，對於漢代歌詩之原生形態考察，必須置於其口傳表演的語境中進行探索，不能單純視之為純文學的書寫創作，始能見其全貌。而在文學人類學的民族誌詩學中，尤重口傳文學的研究。美國的鄧尼斯—泰德洛克（Dennis Tedlock）認為文學研究者把目光僅僅侷限在書寫文學上是一種錯誤，在文人詩歌產生之前，在部落中流行的是集體性表演場合所歌唱之詩歌，書寫文本的詩，喪失了在多媒體表演情境中歌詩傳達的效果及美學<sup>④9</sup>。美國學者弗里（J.M. Foley）亦強調文學研究中口頭傳統的重要性。由於先秦兩漢歌詩傳播方式主要是以口頭的方式，學界已有從口傳文學的角度對先秦詩歌進行研究。先秦詩歌口承詩學之研究代表作，首推王靖獻《鐘與鼓——《詩經》套語及其創作方式》<sup>⑤0</sup>，作者利用口頭詩學理論，指出詩經的口頭傳統及儀式樂歌之特質。對於漢魏歌詩進行套語分析的有美國傅漢思（Hans H. Frankel）<sup>⑤1</sup>以及楊玉成〈樂府詩的套語〉<sup>⑤2</sup>皆指出漢魏樂府的口傳性質。因此本研究上篇的「漢代歌詩原生形態考察」，除了從倡優表演的具體語境探討文本生成中作者、作品與讀者之關係

外，亦採民族誌詩學中對口傳文學研究之視角，進行漢代歌詩作為口傳性（orality）、集體性、表演性綜合藝術的特質進行考察。

由於文學人類學派別不同，各有其學術偏重，本研究特別強調漢代歌詩創作的動態表演語境與文本生成發展之關係。因此上篇以歌詩之創作者、表演者—「倡優」為主，探討倡優身分、身體與樂舞專技與漢代歌詩生成之關係；運用出土文獻材料—漢代畫像石，進行圖像資料與書面文本的比較考察，以見漢代歌詩的具體表演語境與集體性、娛樂性、口傳性質；並從儀式角度分析歌詩展演的動態語境—即席表演語境與漢代歌詩中公式套語運用之關係。下篇為「口傳敘事與原型置換」則以具體的樂府歌詩文本為主，探討漢魏六朝從口傳到書面、從歌詩到詩歌間之創作轉換。末章「原型與象徵」則運用文學人類學中原型批評（archetypal criticism）的視角，以「採桑女」為切入點，探討自先秦兩漢以來，文化文本與文學文本中重覆出現的意象、母題中所蘊涵的集體無意識心理；以及在漢魏六朝文學嬗變中原型置換變形的時代歷史痕跡與社會文化對詩歌創作之影響。

本書原名為「絕唱：漢代歌詩人類學研究」，後因在出版社之出版建議下，更名為「漢代歌詩人類學」，因此本文所指的「漢代歌詩人類學研究」，並非建構漢代歌詩人類學之理論體系；本研究主要是指在文學人類學的研究視野下，以文學人類學為參照體系的漢代歌詩研究。也就是在文學人類學的廣闊文化視野中對歌詩文本及其形成發展的研究。進而還原漢代歌詩創作的動態表演語境，跳脫傳統樂府詩學以「純文學」、「書面文學」的既有批評模式，回歸口傳文學之展演性質以及語境的闡釋，以見漢代歌詩語言之口傳性、遊戲性、集體性與社會性的語言特

質。尋繹漢魏之際，樂府歌詩創作由「無名詩人」到「有名作者」，由集體的娛樂性、口傳性到自我抒情的創作轉換，以見文學語言與本文生成之發展與嬗變。

- ① 〔英〕艾爾弗雷德·哈登 (Alfred C. Haddon) 著、廖泗友譯：《人類學史》（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3。
- ② 〔日〕綾部恒雄：《文化人類學的十五種理論》（北京：國際文化出版社，1988 年），頁 193。
- ③ Ernst Cassirer 著，甘陽譯：《人論》（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7 年），頁 35-39。
- ④ 同上註，頁 38。
- ⑤ 葉舒憲：《文學與人類學——知識全球化時代的文學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年），頁 88。
- ⑥ 李亦園：〈文學和人類學都因文學人類學而拓展〉，樂黛雲、李亦園等：〈文學人類學走向新世紀〉，《淮陰師範學院學報》第 20 卷，1998 年第 2 期，頁 42。
- ⑦ 同上註。
- ⑧ 葉舒憲：《文學與人類學——知識全球化時代的文學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年），頁 87-121。
- ⑨ Northrop Frye, *Anatomy of Criticism*,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 ⑩ John B. Vickery, *Myth and Literature: Contemporary Theory and Practic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66.
- ⑪ 〔德〕沃爾夫岡·伊瑟爾著，陳定家、汪正龍等譯：《虛構與想像：文學人類學疆界》（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年）。
- ⑫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通向一種文化詩學〉，世界文論編輯委

- 員會：《文藝學和新歷史主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頁133-142。
- ⑬ Fernando. Boyatos, *Literary Anthropology: A New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people, Sign and Literary*,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1988.
  - ⑭ Ivan Brady ed., *Anthropological Poetics*,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 1911.
  - ⑮ J. M. Foley, *Immanent Art: From Structure to Meaning in Traditional Oral Epic*,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
  - ⑯ 〔美〕約翰·邁爾斯·弗里著，朝戈金譯：〈譯者導言〉，《口頭詩學：帕里—洛德理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頁17。
  - ⑰ 陸侃如：《樂府古辭考》（臺北：商務印書館，1970年）。
  - ⑱ 羅根澤：《樂府文學史》（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1年）。
  - ⑲ 余冠英：《漢魏六朝詩論叢》（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 ⑳ 蕭滌非：《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臺北：長安出版社，1981年）。
  - ㉑ 楊生枝：《樂府詩史》（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 ㉒ 臺靜農：〈兩漢樂舞考〉，《文史哲學報》，第一期，1950年。
  - ㉓ 王運熙：《樂府詩述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 ㉔ 廖蔚卿：《漢魏六朝文學論集》（臺北：大安出版社，1997年）。
  - ㉕ 廖蔚卿：《中古樂舞研究》（臺北：里仁書局，2006年）。
  - ㉖ 亓婷婷：《兩漢樂府研究》（臺北：學海出版社，1980年）。
  - ㉗ 邱雙友：《中國歷代故事詩》（臺北：三民書局，1971年）。
  - ㉘ 錢志熙：《漢魏樂府的音樂與詩》（鄭州：大象出版社，2000

年)。

- ②9 趙敏俐：《兩漢詩歌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
- ③0 趙敏俐等：《中國古代歌詩研究—從《詩經》到元曲的藝術生產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
- ③1 吳相洲：《唐詩創作與歌詩傳唱關係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
- ③2 樂黛雲、李亦園等：〈文學人類學走向新世紀〉，《淮陰師範學院學報》第20卷，1998年第2期，頁41。
- ③3 葉舒憲：《文學人類學探索》（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
- ③4 張德明：《人類學詩學》（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8年）。
- ③5 容世誠：《戲曲人類學初探—儀式、劇場與社群》（臺北：麥田出版社，1997年）。
- ③6 彭兆榮：《文學與儀式：文學人類學的一個文化視野—酒神及其祭祀儀式的發生學原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
- ③7 胡志毅：《神話與儀式：戲劇的原型闡釋》（上海：學林出版社，2001年）。
- ③8 張德明：《人類學詩學》（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8年），頁8。
- ③9 韓高年：《禮俗儀式與先秦詩歌演變》（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 ④0 〔宋〕鄭樵：《通志》（臺北：新興書局，1963年），卷49，頁626。
- ④1 錢志熙：〈樂府古辭的經典價值—魏晉至唐代文人樂府詩的發展〉，《文學評論》，1998年第2期，頁64。
- ④2 同上註。

- ④③ 〔漢〕班固撰：〈藝文志〉第十，《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年）卷30，頁1753-1756。
- ④④ 倪其心：《漢代詩歌新論》（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2年），頁45。
- ④⑤ 〔梁〕劉勰著，周振甫注：〈樂府〉，《文心雕龍注釋》（臺北：里仁書局，1984年），頁112。
- ④⑥ 同上註。
- ④⑦ 〔明〕許學夷著，杜維沫校點：《詩源辯體》（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卷3，頁68。
- ④⑧ 〔明〕胡應麟著：〈內編·古體中·五言〉，《詩薮》（一）（臺北：廣文書局，1973年），頁84。
- ④⑨ 田兆元主編：《文化人類學教程》（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225。
- ⑤⑩ 〔美〕王靖獻著，謝謙譯：《鐘與鼓——《詩經》的套語及其創作方式》（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
- ⑤⑪ Hans H. Frankel, "The Formulaic Language of the Chinese Ballad, Southeast Fly The Peacocks",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集刊》第39本（下冊）（臺北：中央研究院，1969年10月）。
- ⑤⑫ 楊玉成：〈樂府詩的套語〉，《王夢鷗教授九秩壽慶論文集》（臺北：政大中文系，1996年）。